

44.651

XJB



三 史 丛 书

仇满鹭江潮

厦门码头工人家史选



书

仇满鹭江潮

厦门码头工天家史选

厦门市交通局搬运公司工友写作组 编写
厦门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福建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编了厦门码头工人家史七篇。自从鸦片战争后，厦门被划为对外通商口岸以来，整整一个世纪中，厦门港的码头工人生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最低层。他们经受着非人的遭遇，进行着不屈的斗争，每人都有一部苦难的血泪史。解放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他们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个个精神焕发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革命作出贡献。这些家史，集中反映了厦门码头工人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愤怒控诉，对幸福的新社会的热烈歌颂，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材料。它教育我们要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坚持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插图：吴伟程等

三·史·丛·书

仇 满 鹭 江 潮

——厦门码头工人家史选

厦门市交通局搬运公司工人写作组编写
厦门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173·173 定价：0.22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目 录

前言	(1)
愤怒的控诉	
——退休码头工人钟友家史	(8)
血海深仇	
——搬运女工蔡来春血泪家史	(23)
两个时代两个天	
——退休码头工人郑尚贵家史	(42)
鹭江码头“散工”恨	
——退休码头工人廖菊家史	(58)
历尽风霜志不屈	
——退休码头工人白文家史	(72)
刘师傅年夜忆苦	
——码头工人刘立候家史	(84)
不忘阶级苦 红心永向党	
——退休码头工人蔡洪家史	(95)

前 言

不知道旧社会的苦，就不会懂得新社会的甜。在社会主义的红旗下成长的青年同志们！你们知道在旧社会里，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广大劳动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请读一读收集在这本书里的几位厦门码头工人的苦难家史吧！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要反帝反修，为什么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解放前的黑暗岁月里，豺狼当道，群魔乱舞，厦门港码头是帝国主义分子、反动派、资本家、封建把头们的“乐园”。滔滔的鹭江波涛，流不尽中国人民的辛酸血泪；茫茫的厦鼓海空，装不下码头工人的深仇大恨！

自从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厦门就被划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到反动透顶的蒋介石王朝，这些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都把厦门港的各种主权双手拱奉给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者不仅控制了厦门海关，取得了领事裁判权、驻扎军队权，还划租界，开商行，建码头……。英帝国主义于一八八〇年就在厦门建起了太古码头，其他帝国主义也先后把魔爪伸进厦门港各个码头。厦门港码头成了帝国主义者侵略和

掠夺我国人民的一块跳板，成了它们插在我国劳动人民身上的一根吸血管。

历尽风霜的厦门港码头工人，是帝国主义血腥罪行的历史见证人。是他们，亲眼看见了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情景：帝国主义军舰上荷枪实弹的水兵从码头冲上岸来，残暴地屠杀中国人民；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牧师、传教士之流，从码头爬上岸来，阴险恶毒地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帝国主义资本家从码头上走私贩毒，运进了毒害和麻醉中国人民的鸦片，倾销其“过剩”物资，又从我国掠走了大批的金银珠宝和各种农产品、矿物资源；帝国主义人贩子把从各地拐骗来的成千上万中国劳苦大众带上镣铐锁链，从码头上拖进轮船的底舱，作为“猪仔”卖到外国当苦力。……帝国主义强盗们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又一笔的血债。

为了加强对厦门码头的控制，更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码头工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政府、封建把头互相勾结，豢养了洋奴买办、工头等，作为自己的爪牙。这些工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在码头上的代理人，他们依恃权势，霸占码头，按同姓家族组织诸如“家族自治会”这样的封建行会和帮派，作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把头联合统治码头的工具。在这种封建家长制的法西斯统治下，厦门码头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统治码头的反动家伙们根本不把码头工人当人看待，而把工人称做“苦力”、“乌鬼”、“人工”。他们强迫同姓家族的工人加入“家族自治会”，并交纳高达工资百分之三

十的“会费”，否则就不能在码头做工，非同姓家族的工人只能做“散工”，却同样要缴纳“会费”，并受“家族自治会”大小工头的统治。“家族自治会”还规定工人不许怠工、罢工，而且私设牢房，滥用刑罚，可以任意关押吊打直至开除码头工人。码头工人被剥夺了一切最起码的权利！

码头工人在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的活，劳动强度也是罕见的，但工钱却低得惊人。拿工作比较稳定的同姓家族工人来说，每天的工钱名义上有六七斤大米，实际上扣除了名目繁多的各种“费”，诸如家族自治会费、码头管理费、黄色工会费、码头修理费、工具费、茶水费、出栈费、人头费、号帽费，以至吃空额费等等，拿到的只有其中的十分之三。就这么几个工钱，大小工头还不肯放过。他们挖空心思地想出种种鬼花招，巧取豪夺。比如，他们把工钱按高价折成实物发给码头工人，而工人拿到这点实物又不许拿回家，必须拿到他们开设的“海鸡母店”去变卖。那“海鸡母店”用压价、克扣秤头等手段又抢走这些工钱中的十分之三四。又如拖欠工钱：他们利用反动政府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把码头工人的血汗钱拿去套购美钞黄金，搞投机，放高利贷，等到货币贬值了再发工钱；码头工人流尽血汗，往往只能领到一迭跟废纸差不多的伪币。多少工人被这些毒辣的手段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这些嗜血成性的贼工头比虎豹豺狼还凶狠万倍啊！

在这样残酷的压榨下，码头工人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

挣扎着。他们吃的是米糠、野菜、烂菜头，住的是“日出疏窗影，雨来叮当声”的破草房。许多单身工人更是流落街头巷尾，露宿风餐。今天海后路后面的一条街，过去叫番仔街，就在番仔街原太古公司仓库房外楼梯下一个十几平方米的过道，当年每天夜里挤住着四十多个无家可归的码头工人。这哪里是住所，简直是囚笼。酷暑、严寒、饥饿、疾病，象魔鬼一样吞噬着码头工人的生命。厦门沦陷期间一次鼠疫流行，住在番仔街的码头工人，一下子就死了二十多人，令人惨不忍睹！苦难，贫困，使累弯了腰骨的码头工人大约有一年过四十还成不了家。多少人由于年老残疾，孤苦伶仃，葬身在垃圾堆旁！而码头的反动统治者却在工人的累累白骨之上建起了罪恶的“天堂”，过着荒淫无耻的腐朽生活。这些家伙还搬出孔孟“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谬论来欺骗和麻痹工人，为自己的罪恶辩护，真是反动透顶，卑劣到了极点！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跟全体中国工人阶级一样，厦门港码头工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向旧世界宣战，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他们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和光荣历史。

早在一八五二年，厦门码头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掠夺华工的“卖人行”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给帝国主义殖民者的野蛮行径以严重警告，严惩帝国主义的

人贩子和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义军的一支队伍在厦门登陆，码头工人和广大穷苦百姓，迎接了起义军的队伍，并同他们一起战斗。一八九九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割虎头山一带为租界，码头工人和广大人民义愤填膺，包围了日本领事馆，提出了“保全国土，勿媚外人”的战斗口号，用棍棒、石块狠揍了日本强盗，吓得日本鬼子如丧家之犬。一九一八年，英帝国主义妄图霸占海后滩为“租界”，码头工人无比愤慨，首先起来罢工，并同厦门各界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提出了“驱逐英国番仔”“收还租界”等口号。这个斗争得到福州、上海等地工人的声援，一直坚持了十多年之久，终于迫使英帝国主义全部归还海后滩租界。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厦门码头工人联合广大群众，举行示威，抵制日货，拒用日币，不给日轮起卸，集会抗议日本强盗的罪行，给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厦门码头工人同日本鬼子、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工头、资本家进行了一系列英勇的斗争。解放前夕，码头工人还展开了“反劫运，反破坏”的斗争，保护码头、仓库设施，阻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运输，打乱了他们的逃窜计划，挫败了他们破坏码头的罪恶阴谋，用战斗迎接翻身解放日子的到来！

红旗指处乌云散，鹭江码头换新颜。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四九年十月，厦门解放了，厦门港码头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码头工人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现在，搬运公司从小队、中队到公司一级的领导成员中，有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是码头工人。许多码头工人还被选为人民代表，被提拔到市、局党政工团的领导岗位上来。解放以来，已有四位码头工人先后光荣地上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厦门码头工人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上层建筑领域，领导斗批改，在改造旧世界的斗争中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集体智慧。

码头工人在生活上也大翻身。解放后厦门码头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解放前高七八倍，而且彻底铲除了种种敲诈勒索；码头工人还享受国家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等待遇。党和国家还为码头工人建新村，办工人疗养所……。码头工人无限感慨地说：“过去码头工人是甘蔗取中节；年青当牛马，年老疾病踢一旁，抛尸荒野无人收。如今是生老病死有依靠，一代更比一代强！”

人变地变码头也在变。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后的码头工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立足海港，放眼世界。他们自力更生创大业，用自己的双手，大搞技术革新，制造了各种吊车、升降机、输送机、牵引机等机械。一九五七年鹰厦铁路铺轨到码头，整个码头实现了水陆联运，装卸机械化程度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有的部分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码头工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充分发扬了主人翁的精神，大干快上，生产飞速发展。仅和平码头，现在一个月的货物吞吐量就比解放前太古码头一年的吞吐量还要多得多！这一切

都生动地体现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个真理，是对从孔老二到林彪的一切反动派所宣扬的“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的最有力回击！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厦门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二级师生，遵照毛主席“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和“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的教导，深入厦门港码头，向工人学习，同工人一起，愤怒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并同他们一起，把码头工人的回忆对比材料加以整理。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厦门市委宣传组的指导下，编成这本书。选进这本书的七篇家史，记录了厦门码头工人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和斗争精神的几个侧面。希望它们能够帮助青年同志们不忘昔日苦，牢记阶级仇和民族恨，从而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更坚定地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永远巩固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

愤怒的控诉

——退休码头工人钟友家史

在旧社会，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工头的剥削和压迫，我在厦门码头上流尽血汗，还被迫流浪到海外去卖苦力，可是一件破棉袄穿了二十多年，四十多岁了还不能结婚成家。多亏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我们工人才翻了身，当家做主人。然而，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妄图从我们工人阶级手里把权篡夺过去，复辟资本主义，让帝国主义、反动派、地主、资本家、工头卷土重来，把我们重新推到旧社会的苦难深渊中去。我们坚决不答应！我要用我解放前几十年的苦难经历，愤怒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痛斥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一、父死母卖 流落厦门

我的祖家在厦门郊区钟宅村。父亲是雇农，常年给地主

做短工。为了维持一家生活，他专拣重活干。可我们还是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只好吞糠咽野菜。父亲由于长期劳累和饥饿，在我十岁那年（一九一二年）终于一病不起。狠心的地主、富户们见我们穷，连治病的钱也不肯借。看着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母亲的眼泪也哭干了。过了没多久，才三十多岁的父亲就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抛下母亲和我，寡妇孤儿，相依为命。

可是，这样的苦日子过了还不到一年，母亲又被同族中掌权势的人卖掉了。那时我还小，呼天抢地哭着到处去找母亲。但在旧社会，天暝暝、地昏昏，我这个苦孩子的满腔仇恨向谁去诉说呢？我只好替人家放放牛，做些杂工，挣扎着过日子。

有个经常到钟宅挑糠的大个子福哥，十分同情我这个孤儿，一直很关心我。我十四岁的时候，他出主意叫我到厦门去闯一闯，并给了我五十个铜板作路费及其它杂用。我按照他的指点，跟着一群挑糠的工人，从江头坐船到新填地上岸。

一上岸就是大王宫。初到一个陌生地方，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天黑了，我见许多穷人都挤在大王宫戏台下睡觉，也就钻到戏台下，找了一个角落躺下。

一连几天没有工作，五十个铜板也用完了。这时，有个饭馆的老板想找个洗碗筷的伙计，大伙儿就指着我说：“这个孩子刚来，没有活干，就叫他干吧。”可是，有个不三不四的人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什么我的来历不明，那老板一听

就不要我了。后来，附近一个摆冬粉摊的掌柜要我帮他做杂工，我才能吃到一些残汤剩饭。

有一个码头老工人李大叔，经常来这个冬粉摊吃冬粉。他了解我的身世后，十分诚挚地要带我到码头上去找工做。我就跟他上了码头。

李大叔是在船上操作吊杆的。他把我带到太古埕，让我跟他一起上船。李大叔叫我在舱底用钩子钩住货物，他把货物吊上去。他还教给我一些操作吊杆的技术。操作吊杆的是两个人，我在那里帮忙，李大叔就把他俩的饭匀出一分来给我吃。他们这样照顾我，使我深深地感到阶级情谊的温暖。过了一些日子我才知道，李大叔正患着病，而我却老是分吃他们的饭，长此下去是不行的，于是我决心自己独立在码头上找活干。

那时候，厦门码头被陈、吴、纪三姓宗族的封建把头控制着。象我们这样杂姓的外地人，在码头上没有固定的立脚之地，只能当散工，临时在这里做做、那里帮帮。码头工人在旧社会被那些地主资本家和有钱有势的人轻蔑地称为“苦力”，我们做散工的比一般“苦力”更苦，被叫做“乌鬼”。码头上都是拚死力气为重活，通常一箱货都在二百斤左右，扛一箱货只能拿到一个铜板的工钱。我年纪小，身体弱，扛不动这么重的货，常常是一个铜板也挣不到。老工人们都很照顾我，有时分一点饭给我吃，有时送我一些碎米。我挣不到工钱的时候，只好跑到内地来的客船上向人们讨一些残羹剩饭，或者跑到提督路头拣人家扔掉的烂果子，用海水洗一

洗充饥；有时候，我到衫行街去，碰上人家办红白喜事就帮着扛彩旗，挣几个辛苦钱度日。

到了十六、七岁，我才勉强扛得动二百斤重的货物。我的肩膀压肿了，本来又破又烂的衣服磨得不成块了，可是，我的工钱有时连吃饭还不够，哪里有钱去买衣服穿呢？我只好去拣人家扔掉的破衣服、破麻袋片和烂草席子。有人告诉我：“这些破烂是包裹过死人的。”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没有这些破烂东西，我就无法在船头行的楼梯脚下或马路边睡觉，更无法度过寒冷的冬天。我这个码头工~~人~~，和乞丐~~又~~有多少差别呢？

二、五块叻币 一年冤狱

在旧社会，我们码头工人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最残酷的剥削，而且处处受到歧视和压迫，连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更不要说政治地位了。在码头上摇来晃去的一批国民党水警，整天狗眼盯着我们，只要不顺他们的心，非打即骂，祸事随时都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一天，从新加坡来了一艘轮船。我帮旅客们搬完行李，就在船上废物堆里挑拣一些旅客们扔掉的破罐头、烂纸片等。正挑着，忽然看见一张花纸票，我因为从来没见过，觉得很新奇，就拿在手上反复看。问问和我一起拣破烂的几个人，他们也不认得。突然，一只手钳住了我的肩膀，我使劲站了起来，一看，两个凶神恶煞似的水警正站在我的身后。

一个翘嘴唇的瘦高个儿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问：

“你把旅客的旅行包偷到哪儿去了？”

“什么旅行包？我不知道啊！”

话音未落，另外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一把将我手里的花纸票抢了去，还瞪着一对死鱼眼睛冲着我吼道：

“没有偷，这是什么？”

“这是从这个破烂堆里翻出来的，我也不认得是什么东西。”

那个翘嘴唇的逼上来说：

“还嘴硬，这就是你偷来的钱！”说着，就左右开弓打了我两记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张花纸票是一张五块钱的新加坡叻币。这帮狗警察见钱就眼红，所以捏造罪名，对我进行诬陷，乘机从我手中抢去那张纸票。

当时，在旁边的穷兄弟们都愤愤不平，一齐围上来说：

“这张纸票确实是他从破烂堆里拣出来的，刚才还给我们看过呢！”两个家伙操起警棍把大家驱散，一面不干不净地骂道：“干你们的屁事，谁要多嘴，上警察局去！”

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又在我身上搜来摸去。我忍不住问他们：“旅行包也不能放在身上衣袋里，你们在我衣袋里摸什么？”一句话戳到了他们的痛处，那翘嘴唇又搥了我两记耳光，一面破口大骂：“他妈的，就是要搜你，你要怎么样？”这两个家伙把我全身搜了个遍，搜出了我十多天来辛辛苦苦积攒的一元多血汗钱，就往自己腰包里塞。